



歌德 GEDE YU
与出版 CHU BAN SHANG
商

(德) 西格弗里德·翁泽尔德 著
张世广
刘越莲 译

云南人民出版社



歌德 与 出版商

GEDE YU
CHU BAN SHANG

(德) 西格弗里德·翁泽尔德 著
张世广
刘越莲 译

云南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歌德与出版商/ (德) 翁泽尔德著; 张世广, 刘越莲译. —昆明: 云南人民出版社,

ISBN 7-222-03096-4

I. 歌... II. ①翁... ②张... ③刘... III. ①歌德, J. W. V. (1749 ~ 1832) - 生平事迹 ②出版工作 - 文化史 - 德国 - 近代 IV. ①K835.165.6 ②G239.51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1) 第 25301 号

责任编辑: 韩 旭 瞿洪斌

封面设计: 王玉辉

© Insel Verlag Frankfurt am Main und Leipzig 1991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 23-2000-082 号

歌德与出版商

西格弗里德·翁泽尔德 著

张世广

译

刘越莲

云南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昆明市书林街 100 号)

邮编: 650011

云南新华印刷三厂印装

开本: 850 × 1168 1/32

印张: 12.875

字数: 295 千字

2001 年 6 月第 1 版

2001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7-222-03096-4/I·839

定价: 25.00 元

前 言

在我有关出版史的著作中，有一部出版商传记：《格奥尔格·约阿希姆·格申传》，孙维斯孔特·格申撰（Das Leben Georg Joachim Göschen von seinem Enkel Viskount Goschen）。从书中可以看到，老格申的出版目录中虽然列有歌德、席勒的大名，但老格申觉得，出版魏兰德的著作才是他的10年“大计”。在进一步研究格申孙子所撰传记的过程中，我计划像写《作者及其出版商》一书的论文一样，写一批关于歌德与出版商的论文。但直到1979年库恩版《歌德科塔通信集》出版之后，我的计划才成熟。我的任务是首先写一篇论文，在法兰克福大学为授予我名誉博士而举行的仪式上宣读。以这篇论文为基础，再一步步成书。

整整12年，我把我能够自由支配的时间全都投入到这项工作中去了。那时候，我大部分时间住在于波林根的布欣格尔禁食医院。我这本书寓严肃于游戏，禁食产生一种精神上的快慰，无损于这项严肃工作。

必须承认，如果我事先能预见到困难，哪怕有一点点感觉，我也不会冒冒失失地大着胆子写起来。每一个研究歌德的人，首先必须与他搏斗一番。他将积累两方面的经验。其一：有许多细节问题必须先弄清楚，才能为自己开辟出研究的空間。我告诫自己，必须阅读歌德，读他的作品，读他写的文章和书信，不要读那些二手材料，这些东西往往起误导作用。但

若看不到歌德学家们往往花费毕生精力取得的研究成果，就未免显得狂妄。我觉得我是站在巨人肩膀上的侏儒，在照着他们的样子去做。其二：任何人谈论歌德思维和创作过程的演变和事实、阶段和结果，都不会有歌德本人说得好；用半通不通的话对歌德作些简单解释，用几个概念去概括歌德的思维进程，是毫无意义的。我们从他的《色彩学》序言便可看出他的“特殊观察方法”：“评论别人的观点，尤其那些近似、交叉和相同的观点，困难至极。话若说得太多，会叫人失去耐心、觉得无聊；如果把自己的思想概括起来，又有把自己的观点强加于人的危险；假使回避评论，读者就不知道他是怎么回事；倘若遵循某些准则，描述又会显得偏颇，可能引起矛盾，故事中又将生出故事。此外，一个知名作者的思想观点不是那么容易用言辞表达的。一切基本的教训都不是那么容易总结、概括和系统化的。”就是说，最好的办法，是还歌德的本来面目，原封不动地引用他的话，包括一些读起来嫌累赘的大段引文。

我从未想过要写出一部严格意义上的著作科学，而且还要遵循一些严格的标准。我只是完全按照我的主观视角来写：今天的出版商，他熟悉作者——出版者关系中今天存在的问题，就是说，他拥有实际工作经验，他会从今天出发，特别关注歌德与他那个时代出版商打交道的特殊性。当然，凡从事歌德研究，都必须以诠释可靠文字材料为基础。只要是研究歌德的人，都会对（歌德的）工作与生活，对其内心世界和外部世界提出许多问题，而且这些问题必然与研究者从个人角度发现的东西有联系。作者与出版商的关系也好，出版商与作者的关系也好，都是多层面、复杂的，极少仅仅局限于书稿。研究这样的关系，自然也要涉及作家的生存、他的世界、他的环境、他生活的时代及其作品反映的时代。因此，这样的研究就免不了

会有某些表面上跟主题没有关系的话和不可避免的偶尔重复。

在研究过程中，除了海岛出版社的单行本之外，我主要使用阿尔特密斯（Artemis）版本，后来也参考汉堡版、柏林版以及“青年歌德版”。遗憾的是，歌德作品的慕尼黑和法兰克福新版的进步幅度不够大，有些东西我从现有各卷的评论中已经知道。我曾以魏玛版为依据，尝试将歌德作品的文字统一起来。信件、日记以及艾克曼的记载只用来验证日期。引用第三者的作品和文字均注明页码和行数，列在附录里。在行文过程中，如果引文不易理解，则以数码提示读者参阅附录中的说明。我希望这些说明能起到相得益彰的作用。

引论：天生的作家

20岁的托玛斯·曼，“梦想”拥有一本费舍尔出版社出版的書。里尔克1906年11月10日致信海島出版社出版商基朋貝格，说他“诚挚的要求是最终把未来的書悉数交其出版。”

卡夫卡1912年8月14日致恩斯特·罗沃尔特（Ernst Rohwolt）的信里说他“渴望也拥有贵社出版的一本漂亮的書”。

赫尔曼·黑塞和布莱希特的愿望是将他們的書全部交给彼得·苏尔坎普出版。布莱希特说：“我当然无论如何都想厕身您领导的出版社。”

歌德是否作过如此明确的表白，没有资料保存下来。他要是夸奖出版商一次，紧跟着就会斥责一次。

歌德一生对出版商抱着怀疑态度，斥责他们是“德国图书出版发行这个行当的阴暗面”。为什么歌德与出版商的关系总有那么多问题？贺拉斯早已把作家归入“敏感先知之人”（*genus irritabile vatum*）。时至今日，我以为仍然如此。然而问题也可能与出版商的本性有关。他们试图变不可能为可能，创造和销售“那种神圣的……商品。”（布莱希特语）他们试图将精神与金钱、心灵与商品结合起来，也就是把那种尽人皆知的、根本上互相排斥的东西结合在一起。安多诺（Andorno）自言他的有些做法违背常理：“有些东西虽然成功却不可贩卖，也无法使它化异域为本地。”

是否，或必定有人把这种努力视为疯狂？赫贝尔（Heb-

bel) 就是这样，他说过，和耶稣在浪尖上散步，要比同出版商一起过日子容易。

而魏兰德和其他一些人已经看出图书具有双重性质，既是精神又是商品。因此他们指出，作者与出版商之间的冲突正产生于此。

所以歌德开头表示“信赖”他的出版商科塔，而 31 年之后又盼望他人“地狱”，这就触及到事情的本质了。这些出版商啊！歌德对他们始终抱着批评和怀疑态度，经常有失公正，总是不信任他们。席勒 1802 年 3 月 17 日致歌德的信里说，这些先生们“还要求我们促进他们事业”，是“十足的兽性”。歌德在回信中愤怒地答复：“所有这些包装书的家伙”，他说，“献给他们的是最大的仇恨”。我们要再说说这件事。

不管怎么说，歌德始终是个作家。他是天生的作家，临死还在写作。所以托玛斯·曼对歌德临死前的动作做出解释：他把标点符号往空中画，说明他的意识在“最后的梦境中渐渐模糊”。打从一开始，歌德就意识到自己是作家。“我本来天生就是作家，每当我按照我的思想漂漂亮亮写下点东西时，我比平时总是更加开心。”没错，在“更加开心”之外，不久也加上了听天由命、怀疑、绝望，以及在生命的每一刻都在已堕入被迫写作境地的感慨。不仅是 1820 年的歌德知道（见当年 12 月 22 日致维勒默尔信），“写作是一种不治之症，因此屈从于命运也是一种快乐”。这一点特别切合德国作家：“一个德国作家，一个德国殉道者！”歌德是个地地道道的作家。离开写作，他的生命就无法存在。他是不是一个像人们说的，有成就的作家呢？他的写作成果能维持他的生计吗？

在他走上写作道路之初，有两项巨大成就：《葛兹》和《维特》。在《葛兹》里，他“演绎出我这个类型的伟大世界时

代的象征。”他在《葛兹》中“按照我的方式反映了世界一个重大时期的象征”。后来在《诗与真》里谈到这一反映的成功时他说：“如果把一个民族的历史放在修养高度再进行回忆，就会产生一种普遍的快慰，愉快地对祖先们的道德报以微笑，相信早已克服了祖先们的缺点。因此这样一种描写不能缺少关爱和赞许。在这个意义上说，我高兴地看到一种全方位的影响。”我们最低限度得用“快慰”这个词来评价这个剧本的影响，而《少年维特之烦恼》的影响更像是一场风暴。青年人当中发生的那股传染病似的寻死风对作者本人，对他那种“独立性”，也不是没有留下后遗症。在写到他的生平时他确信：“这本小册子的影响很大，大极了，主要原因是写得恰是时候。就好像要引爆一颗巨型地雷，只需要点燃一根小草，就会在读者中发生爆炸，威力之所以那么大，是因为青年人已经在自我埋葬。震动那么大，究其原因，乃在于每个人胸中那种过分的要求和尚未满足的激情都能够迸发出来。”在取得初期两项成就之后，他在文学影响方面出现了一个间歇期，这就是开始在魏玛宫廷供职的10年，是他牺牲“重要事情”的时期。间歇期很长，一直到他结出并且收获生活与事业的“最后果实”才结束：他的出版商科塔把他的作品，即“亲自最后审定足本”，称为“民族纪念碑”。

歌德一生既不是富翁也不是穷汉。歌德生活中的经济背景如何呢？他经济方面之所以比较独立，原因在于家庭财产。他祖父弗里德里希·格奥尔格·歌德（Friedrich Georg Goethe）自1687年起定居在法兰克福，是个非常精明能干的生意人，很会赚钱，又娶了个有钱人的女儿为妻，歌德后来也沾了光。老爷子1730年去世，给后人留下的钱有17袋之多，计19 000古尔登（德国古代金、银币名）；此外还有实物，价值70 000古

尔登。他儿子（歌德之父）约翰·卡斯帕尔（Johann Caspar），大学毕业文化水平，身为法兰克福皇家荣誉顾问，却终生没有一个可以赚到钱的正式职业。但他善于持家理财，使他和家人拥有2 700古尔登养老金和利息。有了这笔钱，他和家人不仅可以舒舒服服过日子（当时的市长年薪才1 800古尔登），而且他家的财产只减少20 000古尔登，即仍然拥有70 000古尔登。他死后，这笔财产为他夫人继承，他夫人便可以有力地资助儿子约翰·沃尔夫冈（歌德的名字，“歌德”是他的姓——译者注）。就是说，从摇篮里开始，贫困就与歌德无缘，他一生没有尝过穷的滋味儿。我不知道有哪一位著名文学家是在如此丰裕的物质生活基础上开始自己人生旅途的。卡夫卡、布莱希特、黑塞、托玛斯·曼，他们全都必须从自力更生开始。据夏洛特·布夫（Charlotte Buff）的未婚夫、后来的丈夫克斯特纳（Johann Christian Kestner）说，在维茨拉尔，歌德就是出名的“富家”子弟；汉诺威医生齐默曼（Johann Georg Zimmermann）这样描述歌德：他是“一个大富翁”的独生子，父亲“有着皇家顾问头衔，在法兰克福靠养老金生活。他父亲要求他选择一项职业，所以他后来成了法学博士，不管愿意不愿意，他偶尔当律师，还真干得不错。”

1775年11月，26岁的歌德应卡尔·奥古斯特公爵的邀请来到魏玛。公爵把他当作朋友和顾问，希望他能担任宫廷诗人一类的职位。我们从歌德致友人梅尔克的信里可以看出，歌德开头很困难：“我现在完全陷在所有宫廷和政治纷争中去了，恐怕再也脱不了身。我的地位倒也非常有利，要想亲眼看看世界上的角色怎样活动，魏玛和埃森纳赫宫廷始终是个舞台。我不会鲁莽行事，在这个位子上，我能否立即比过去更加清楚地看出暂时的富丽堂皇后面污七八糟的东西，无拘无束和衣食无

缺是重新整顿的主要条件。”歌德的地位也并非那么有利。开始阶段他不得不依靠乃父供给的 400 古尔登过日子。这个时期歌德牢骚满腹，因为他虽然身为自由帝国城市的贵族，但对贵族之间的社交活动和宫廷腐败现象感到不满；假如非这样不可，那么公爵就应该为他负责。公爵赐给歌德的头一份礼物，就是在 1776 年 4 月，即他来到魏玛一年半之后，把伊尔姆河畔一幢带花园的小房子赏给他住。就在同一个月，歌德获得了魏玛的公民权。7 月，他以枢密院公使衔参赞身份开始在国家机关里供职。公爵从私人金库里拿出 600 塔勒给歌德补发了 1 至 6 月的薪金。歌德 1780 年前的年薪为 1 200 塔勒，至 1784 年为 1 400 塔勒，此后至 1799 年为 1 600 塔勒，1780 到 1814 年为 1 800 塔勒。在这个时期，1 萨克森塔勒合 2 法兰克福古尔登，到这时，他的收入才逐渐赶上他父亲的利息。从 1815 年起，由于他是最老的魏玛国务部长，年薪上升到 3 000 塔勒。根据现在掌握的情况，这个年薪数额一直到他去世再没有增加。

菲利普·弗里德里希·赛德尔（Philipp Friedrich Seidel，先前是歌德父亲的仆人）的账簿为我们提供了有关歌德经济收入的情况。赛德尔 1775 年陪同歌德来到魏玛，1788 年以前给歌德当仆人，随后做秘书。从赛德尔那里我们知道，当时魏玛薪俸微薄。夏洛特的丈夫、司马施泰因的薪金为 1 600 塔勒，侍从人员 1 000 塔勒，宫中女官 300 塔勒。赫尔德尔位居教会监督，薪俸 1 100 塔勒；歌德领导下的女演员施罗特（Corona Schröter）400 塔勒。歌德的薪俸，从一个角度看，绝对可观，但就他那“开销比较大的生活”而言，却又不够用。据赛德尔记载，歌德 1776 年才挣 1 200 塔勒，开支却达到 1 411 塔勒；1780 和 1782 年薪俸加到 1 400 塔勒，而开支却分别为 2 249 和 2 605 塔勒。赛德尔不得已一再提醒他，开支要打紧一点。1781 年，

赛德尔有一次警告他的主人要注意节约，少买点酒，少购些书，特别是少花些邮费，宁可省点钱，交给“邮政马车”寄去，也不要总是交给“骑马信使”多花钱。但赛德尔的警告没起多少作用，年复一年还不得不依靠法兰克福那边接济，幸亏歌德有福气，那边也拿得出钱来。

也就是说，歌德的经济情况通常不是特别好。他一生虽然从不铺张浪费，但在金钱问题上却也慷慨大方。歌德给艾克曼开的工资确实很少，可是“照顾”得却非常之多，瓦尔泽（Martin Walser）称之为歌德的大少爷作风。

在一次确定战时税的时候，歌德声明他没有财产。1807年，照他自己算，他的财产为4 600塔勒——这时他在魏玛已为国家效力32年。他母亲1808年去世时，他家的财产虽说已大不如前，但仍然还有22 000古尔登，歌德所得遗产仍有12 750古尔登。就59岁的歌德而言，纵然有了这笔财产，也还不是富翁，但按照他自己的方式过日子也不会有问题，多消费点酒，或者多花点邮费，也还无须仆人精打细算。

不管怎么说，歌德在物质上很优裕。打从一开始，他和出版商谈判就很从容，可以提出与他声望相适应的要求。可是问题在于：为什么他和出版商的关系问题那么多，那么错综复杂，一团乱麻似的？我拟从作为作者的歌德以及他的出版商这两个方面对这个问题详加探讨。席勒很了解歌德的态度：“他对他的出版商本来就不是宽宏大量的。”

然而，要说歌德对待出版商的任务、对待像布来特科普夫、莱西、弗罗姆曼、霍夫曼这样的书商兼出版商态度友好、务实，证据也很充分。提到翁格尔、格申和科塔这几个主要出版商时，歌德往往大加称赞。在《诗与真》12章，他认为作者与出版商之间要有一种“平衡”。他写道：“就像人们希望看

到的那样，他们双方是作为保护神、作为诉讼代理人出现的，前者除了有天才，读者通常还把他們看做品德十分高尚的人，因而崇敬他们，所以他们具有精神地位，觉得创作带来的幸福就是奖赏；后者喜欢以位居第二为荣，享有实惠多。”关于作者和出版商关系的最后一句话真的就一言定性了吗？出版商真的对“享有实惠多”感到满意吗？作者真的“觉得创作带来的幸福就是奖赏”吗？席勒告诉我们（1798年4月28日）：“对书商有益的，从任何意义上说（原文如此！）对作者也有益，谁得的稿费多，他的书看的人也多，这是两个值得赞美的前景。”可是作者与出版商之间的关系就只有这些吗？歌德的天才，这是“艺术商品”最终曾经要表现的。这一天才就在于，他在每一个生活阶段都找到了能够使他“把生活变为艺术商品”的合适人选：老师、情人、倡导者、合作者、经纪人——还有出版商。然而，要达到这一步，需要走很长的路，而这里始终有一个根本的疑惑。

这些人从何处来？这种敏感、这种严峻态度的背景何在？为了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必须进入歌德与出版商之间关系的细枝末节。当然，我们不能迷恋一切细枝末节，因为严格说来，这等于搞清楚、写清楚70部单行本和18部全集（包括13部‘原始’盗版在内）的出版史。歌德和他那个时代出版商的关系如何？什么东西帮助他和一个个出版商建立起联系？与各个出版商的关系有何结果？在找到科塔这位合适出版商之前，他为什么频繁变更出版商？这些出版商都是谁？他们怎样认识自己当时的任务？与出版商的交往是否也反映出歌德作品产生的过程及其影响？我们将探索这些问题的（从最早不署名作品的出版到“最后亲自审定本”）答案，这也和身处关系之中的出版商密切相关。

目 录

前 言	1
引 论	1
第一章 早期作品	1
1. “我根本不爱吵闹声”	1
2. 出版商拒绝出版他的第一部作品	3
3. 第一部伟大作品《葛慈》	9
4. “别人的事我不想”	19
5. 歌德与其著作的盗版者	29
6. 歌德要求惩罚书商	38
第二章 歌德与格申	41
1. “我天生是作家”	41
2. 夏洛特·封·施泰因，奉献，演出形式：我们自己 演自己	50
3. 经纪人	71
4. “书的尊严”——第一个合法版本	79
5. “不得已……另找出版商”——与格申断绝 关系	93
6. 格申崛起——一个出版商的命运	96
第三章 格申与科塔	108
1. 1789 年与《罗马狂欢节》	108

2. 温格尔的收获	122
3. 《赫尔曼与窦绿苔》及其他	151
第四章 投向科塔	167
1. 科塔起家记	167
2. 席勒与科塔——相互尊重	174
3. 《时序》——连接的纽带	187
4. 经纪人席勒	211
第五章 第一部歌德全集——歌德与科塔	216
1. “机不可失”——关于第一部歌德全集	216
2. “作品”的问世与科塔“往最坏处着想，朝最好 处努力”	238
3. 科塔与歌德具有个人风格的“其他作品”	251
4. 说明：关于歌德与科塔的书信往来	257
第六章 第二部全集——歌德与科塔 (1815 年 ~ 1819 年)	278
1. “德国人的命运”——1812 年 11 月至 1814 年 12 月	278
2. 《东西合集》(1814 年 ~ 1819 年)	289
3. “或许这是我最后一次看到我的作品完整出售了” (1814 年 ~ 1816 年)	310
4. 说明：关于出版歌德作品的构想	317
5. “法律不行聪明补”——聪明反被聪明误 (1815 年 ~ 1819 年)	319

第七章 “最后亲自审定”——“我生活中最重要的事”	326
1. 由“激情历验进入纯粹历史光环”——玛利亚巴德与“激情三部曲”	326
2. “思维与行动”——开始准备“最后亲自审定版”	333
3. “最高勋章”——获得特许出版权	340
4. 大拍卖：36家出版社整科塔	347
5. “整个德国都在问：科塔将出版大文豪歌德的书吗？”	353
第八章 科塔，歌德的出版商（1825年~1832年）	362
1. 歌德与科塔的“主要事业”	362
2. 歌德席勒书信谈——歌德席勒通信集出版过程 ...	366
3. 歌德与策尔特通信集——歌德未能看到出版的作品	376
4. “书商统统是魔鬼”	382
5. 从《浮士德》出版看与出版商的关系	385
6. 后期作品	391

第一章 早期作品

1. “我根本不爱吵闹声”——早期不出名的作品

贝里施（Ernst Wolfgang Behrisch）是歌德青年时代的朋友，一个世界上性情特别古怪的人，当时是莱比锡林德劳伯爵的家庭教师。歌德在《诗与真》中说，贝里施虽然“豁达大度”地接受他的诗作，但也告诫他注意公众。歌德写道：“什么东西都别拿去印，只有在这个条件下，他才不干涉我。”作为一个年仅 24 岁的年轻人，他在一封信（1774 年 8 月 21 日致弗里德里希·海因里希·雅各比）中写下了这么一段话：“凡是写作之初和末了，都在复制我周围的世界，通过内心世界抓住一切，把它们联系起来，重新创造，捏合起来，用自己的方式（手法）再展示出来。这永远是秘密，谢天谢地，我决不会把它告诉那些喜欢看热闹的人和多嘴多舌的人……然而有谁会为了读者把自己变成孩子！……然而我求你把人留给我，人在我面前是打上了印记的，人不会再生出马可和爱利斯，就像高特舍德作品中的熊一样。”这段话像一位专业作家最初面对公众说的话一样，同样是创造性的信念。这段关于创作秘诀的话，寓意久长，我在这里不想作进一步的解释。歌德的解释，用自己的方式通过内心世界复制外在世界，早年已经显示出一个作家豁达态度的影响。他这样的作家，不顾正统态度、僵化观点、世